

8

长安城与唐代多元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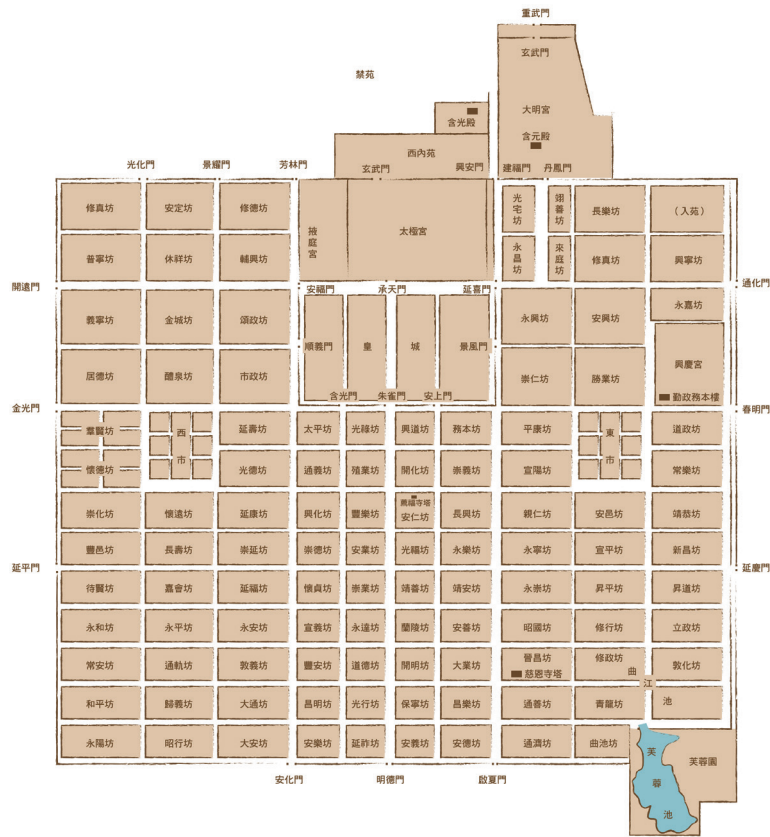
长安位于关中地区¹，是西汉、隋²、唐等十三朝的都城。618年，唐高祖将「大兴」易名为「长安」，取其长久安定之意，设首都于此，寄语对国家发展的期盼³。

开放多元是大唐文化的代名词，而长安作为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其寺庙林立，外国旅客络绎不绝，市场交易频繁，更是完美阐述了唐朝的气质。故此我们不妨以首都长安作为切入点，并以宋人吕大防的《长安图》剖析其城市结构，从宗教和商贸两个层面，感受唐文化的多元色彩，继而以文物《苏谅妻马氏墓志》为例，分析中外文化融合交流的情况。

长安的城市布局

据统计，长安的人口高达一百万⁴，占地84平方公里⁵，或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人口的聚居地。长安的城市布局与隋大兴城大致相同，不过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唐代君主也作出相应的扩建，并新建大明宫。

我们现在对长安古城的认识来自吕大防的《长安图》⁶及其他文献。现代考古学家以吕大防的绘画重现唐长安城的面貌，研究出长安城方正对称，印证了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的说法。以下将辅以经修复的《长安图》解说长安城方正、对称的特色：



[宋] 吕大防《长安图》复原图

为什么说长安城「方正」？

长安城分为三重，宫城是皇廷所在地；皇城则为百官之所；外廓城是一般贵族和平民的居所及活动之所⁷。城市四面由夯（音：坑）土城墙围绕，清楚标明城市的范围，在不同方向设木城门由士兵守卫⁸，防卫森严。长安城以里坊制度划分区域，一个方形的城市被划分成108坊，东属万年县，有54坊；西属长安县，有54坊⁹，每一坊四面都有墙围绕¹⁰。

¹ 大概是现今西安一带，但唐代的长安城规模远大于现代的西安

² 名为大兴

³ 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页15

⁴ 刘章璋：《唐代长安的居民生计与城市政策》（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页90

⁵ 龚国强：《再现辉煌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精粹》，《大众考古》，2019年12期，页21

⁶ 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页7；李健超：《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页291；「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一书的记载，《长安图》，元丰三年正月五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汲郡吕公大防，命户曹刘景阳按视，郃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宫，并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旧图及韦述《西京记》为本，参以诸书及遗迹」

⁷ 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民族研究》，2000年03期，页63

⁸ 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页23

⁹ 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人文杂志》，1981年02期，页83指出长安有109坊，东有54坊，西有55坊；但实际上里坊的数目有波动，此处取108坊为数，是因为此数较普遍。来源出自龚国强：《再现辉煌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精粹》，页20的考察：「里坊数先后略有变化，唐初置时为108坊，后因大明宫新建，其南里坊分割而旋增为109坊，至开元十四年（726年），因兴庆宫扩建又成108坊，遂成定制」；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页63，则明确提出东西里坊的数目均为54

¹⁰ 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页84

为什么说长安「对称」？

长安城东西结构对称，各司其职。城内以要道朱雀大街分割东西，两个市场因为方位不同，被称为「东市」和「西市」。东边人口较多，发展地方较少，属于平民住宅区，最下方有一曲江芙蓉池，不过并非公众开放场所，只有高中进士才有参加「曲江大会」¹¹的资格；西边则有较多地方，贴近丝绸之路，中间有售卖贵价货品的西市，西市附近有不少胡寺，是繁华的商贸文化地带。

长安的城市管理怎样？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必须有严格的指引，以维持秩序，长安的宵禁制度就是一例。六街各设街鼓，鼓声响起，城门、坊门就要关闭¹²，夜间禁止出入¹³。直至早晨再次敲鼓，城门才会再次打开¹⁴。城市设左右街使夜晚巡逻¹⁵，如发现犯夜者，则用鞭或竹板打其身体二十下以作惩罚¹⁶；越坊市垣篱者，则杖七十¹⁷。遇到紧急事务或婚嫁丧病等特殊状况必须夜行，就应持官府或本坊文牒，经检查后才能夜出坊门¹⁸。

我们能从长安的布局和城市管理得出什么讯息呢？

长安城方正对称，毫无疑问是出于精心规划。如此精心的设计使城市井然有序，内外交通便利，促进了中外的文化交流，是长安繁盛的必要条件。

从另一角度来看，长安城的布局也有维护皇权的目的。长安如一个围城，城的外围、里坊都有夯土护墙围绕，既隔绝外来威胁，又明确控制居民的活动范围；六街的终点是不同方位的城门，设常驻守卫，即使城内有动乱也能够快速到达。城市的硬件配套不但有保护的作用，更具一定的监察功能。配合宵禁措施和严谨的《唐律》，就可确保城市秩序的稳定。唐文化虽然多元，但我们也可以从城市的管理窥见政府对人民的严格控制。

¹¹ 曲江大会为新科进士的集宴，也是身份的象征

¹² 肖爱玲、周霞：《唐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月41卷01期，页68引赵贞《唐代长安城街鼓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一文指出官城、皇城城门在五更一点开启，按现在时间推算应为凌晨3:24；日入前五刻闭门，即17:48。京城（外郭）门四更一点开门，相当于凌晨1:40分。对于外郭的闭门时间两者有不同看法，赵贞按日入前十四刻闭门，推算时间大概在15:38；而肖爱玲及周霞则认为外郭门的关闭时间要更晚，应在17:48后

¹³ 肖爱玲、周霞：《唐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研究》，页63

¹⁴ 同上注，页67

¹⁵ 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页57引《新唐书·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卫》

¹⁶ 肖爱玲、周霞：《唐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研究》，页67引《唐律疏议》：「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违者，笞二十」

¹⁷ 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页57

¹⁸ 肖爱玲、周霞：《唐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研究》，页67-68

从不同面向看唐的多元文化

上文勾勒出长安城的具体形象，以下将分别介绍长安城的特点，证明其如何达致文化的开放及多元：

（一）交通便利，水陆皆宜

交通便利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长安四通八达，有利文化和商业交流。长安城有精心的城市设计，这点可见于城内的六条主要道路——「六街」¹⁹，每条街都通往城门，东西相连、南北互通，陆路四通八达，方便其他地方人士来访：

1. 开远门街至通化门街²⁰
2. 金光门街至春明门街²¹
3. 延平门街至延兴门街²²
4. 安化门街至芳林门街²³
5. 明德门街至朱雀门街²⁴
6. 启夏门街至兴安门街²⁵

此外，长安被渭水、泾水、灞水、浐水、沣水等八条河流环绕²⁶，便于排水和灌溉²⁷，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自隋代开始挖掘大运河，唐继续这个工程，构建成完善的水路网络。配合运河系统，日本、朝鲜、印度、波斯、大食等各地商旅都能轻易以水陆两路到访长安城²⁸。

文献显示有不少外国人在长安进行文化商贸交易，并在此常驻生活，甚至成为唐朝官员²⁹。长安的商业蓬勃发展，而非法勾当之事亦时有出现，由敦煌莫高窟出土的《胡商遇盗图》便清晰描画了三个汉人盗贼伏击胡商团队的情况。

¹⁹ 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页23

²⁰ 肖爱玲：《古都西安：隋唐长安城》（西安：西安出版社，2008），页104

²¹ 同上注

²² 同上注

²³ 同上注

²⁴ 同上注

²⁵ 同上注

²⁶ 王瑾：《汉唐长安》，《丝绸之路》，2017年05期，页63

²⁷ 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页25

²⁸ 武复兴：《唐长安的市场和商业》，《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02期，页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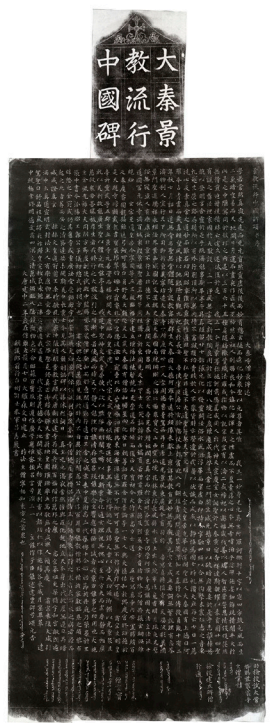
²⁹ 同上注，指出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也作朝衡）曾在唐王朝任秘书监、散骑常侍等职；印度人罗好心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

(二) 庙宇繁多，百花齐放

长安是文化之都，这可体现在林林总总的寺观建设，不同的宗教在此扎根，合共有151所宗教场所。著名的寺庙要数大慈恩寺，乃是长安四大译经场之一，玄奘法师在此潜心翻译佛经十余年，佛教历史遗迹大雁塔也位于寺中。除此之外，长安的宗教也别具异域色彩，景教自唐代传入中国，长安城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向我们交代了景教在唐代流行的情况。寺庙的具体例子及种类可参考后文「长安城宗教列表」。



大雁塔
(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大秦寺景教碑
(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为什么长安城庙宇众多？

庙宇的作用不仅于供奉神明，还有其他附加价值。它们既是宗教场所，也是旅馆。据统计，唐国子监收各州府学生，最高时期有八千留学生³⁰，面对如此多的外来人口，庙宇就成为了商人、士子住宿、修业的临时居

所³¹。寺院风景优美，庭院清幽，同时也是文人骚客联谊之地，有赏花、赏月的雅致活动³²，不少唐代文学作品都有提及。

长安的寺观多建在里坊一隅，方便宗教活动³³。108坊过半数都有涵盖宗教网络³⁴，多数寺观分布在外廓北部，即长安的中心区，贴近宫城、皇城的核心区及两市的中心商业区，是居民集中的热闹繁华之地³⁵。下表就此作简介：

长安城宗教列表³⁶

	数目	宗教	例子
僧寺 (男)	81	佛教	大慈恩寺(大雁塔)、 荐福寺(小雁塔)、大兴善寺 ³⁷
尼寺 (女)	28	佛教	龙华尼寺、法明尼寺、 昭成尼寺等
道观 (男女)	30	道教	玄都观 ³⁸ 、玄真观、华阳观等
女观 (女)	6	道教	金仙观、玉真观 ³⁹ 等
胡袄祠	4	拜火教	分别位于布政坊、义宁坊、 醴泉坊及崇仁坊 ⁴⁰
波斯观	2	景教	位于醴泉坊、义宁坊有大秦寺 ⁴¹

³¹ 李芳民：《唐都长安的道观与诗人的诗歌创作》，《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05期，引杜光庭《神仙感遇传》：「进士王璠，因投旅馆住宿不成，遂入丰邑坊景云观租一独院居住，每月五百文即「税糶秣驯焉」；裴翱《传奇·许栖岩》亦载许栖岩举进士时「习业于昊天观」

³² 同上注

³³ 刘章璋：《唐代长安的居民生计与城市政策》（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页87

³⁴ 肖爱玲：《古都西安：隋唐长安城》，页119指出109坊中有77坊设寺观

³⁵ 同上注

³⁶ 刘章璋：《唐代长安的居民生计与城市政策》，页86，引[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³⁷ 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页24

³⁸ 刘禹锡赋诗两首于此观，诗中的刘郎是指刘禹锡本人，从诗中可见诗人在玄都观赏桃会友：「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³⁹ 《唐会要》卷50：「金仙观辅兴坊。景云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为第八女西宁公主入道立为观。至二年四月十四日。为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观便以金仙为名；玉真观相对。本工部尚书奕庭宅。武后时为崇先府。景云元年十二月七日。第九女昌隆公主立为观。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所造观便以玉真为名」

⁴⁰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06期，页418

⁴¹ 武复兴：《唐长安的市场和商业》，页42

³⁰ 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页86

长安城的寺庙可反映唐文化的什么特点？

长安城宗教百花齐放，体现了唐的开放多元文化内涵。

种族共融

从上表可见，长安城同时存在多种宗教。佛教是唐代的一大宗教，故佛寺数量最多。但佛教是外来宗教，早在汉代已经从印度传入。唐皇族姓李，并自称为老子后人，故道教成为唐朝的国教，而长安城的道观数目亦甚多。除了在中国扎根的佛教及本土的道教，西亚、中亚的拜火教、景教、摩尼教等不同教派也在长安设立宗教场所，虽然数目不及佛寺和道观，但也可以体现对少数宗教的包容。

有如此数目庞大的宗教建筑及多元的宗教文化，反映了长安城对外交流的频繁，不同种族纷纷到来，虽然彼此的信仰不同，但却能在这片土地共存共处。

性别阶级平等

一般而言，宗教的性质是树立一个大同社会，导人向善，追求精神的圆满。故此，要使不同宗教能有所发展，先要尽量移除不平等因素，比如性别及阶级的差异。长安的寺观设计充分考虑不同性别的宗教需要，既有专门为男性而设的僧寺，也有为女性量身打造的场地，如尼寺和女观；甚或男女共用同一地方，诸如道观。证据甚至显示女性道教信徒的数量曾一度超越男性信徒⁴²，反映了不论是何性别，在唐长安城都享有宗教自由，社会性别相对平等。

另一方面，无论是唐贵族皇室人员还是平民都有投身宗教的权利。女观的建造乃公主出家修行的居所，比如睿宗为第八女西宁公主入道，因而建金仙观；与金仙观相对的玉真观便是为昌隆公主而建⁴³。另一方面，普通女性如果要修行，可选择进入女观，或投入尼寺、道观。所以，不论出身在皇家还是平民家庭，都同样有投身宗教的自由。

(三)东西二市，络绎不绝

从古籍可见，长安有不少外来人口，他们在此进行文化贸易交流，有些甚至在此居住。长安城有两个市场：东市和西市，分别位于朱雀大街左右。

东市

研究指出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有部分东市遗址，其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00余米，街道呈井字形，比西市的街道宽一倍⁴⁴。[宋]宋敏求《长安志》有「公卿以下民止多于朱雀街东」⁴⁵的记载，可见东边是长安的平民区。人口密集必然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甚大，古书所记东市有220个行业⁴⁶，涵盖食物、日用品、消闲、零售、服务等⁴⁷。

西市与丝绸之路

东市人口密集，并无地方作仓库存货，商人转而投向西市；西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外国商人到达长安之后最贴近西市，所以他们便在此交易。故此，西市较东市繁华，有更多奇珍异宝⁴⁸。

商人中又以波斯人、大食人、粟特人⁴⁹最多，他们被称为「胡人」⁵⁰，其中波斯人擅长鉴定玉石，故多经营玉石、珠宝业⁵¹；而粟特人则是商业民族⁵²，他们多住在长安城西部，经营店铺也多在西市。西市的南大街中部，出现似是珠宝店的遗址，有许多骨器、珍珠、玛瑙、骰子等物⁵³。骰子是中亚大陆当时流行的玩具，西市商人将骰子与珠宝一同售卖，引人联想此货乃出于胡人⁵⁴。

因为大量胡人流连长安，唐代的艺术品——「唐三彩」⁵⁵便有大量与胡人相关的题材，常见的有釉陶马、牵马胡人俑及胡乐师骑骆驼陶俑等瓷器造型。除此之外，波斯银币、罗马金币、阿拉伯银币以及波斯人〈苏凉妻马氏墓志〉等文物也出土在西安西郊或西南郊⁵⁶，印证了以上的说法。

⁴⁴ 肖爱玲：《古都西安：隋唐长安城》，页125

⁴⁵ 《长安志》卷八

⁴⁶ 《长安志》卷八：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

⁴⁷ 刘章璋：《唐代长安的居民生计与城市政策》，页96-97

⁴⁸ 于赓哲：《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第二讲隋唐人的城市生活（二），页39

⁴⁹ 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页63

⁵⁰ 武复兴：《唐长安的市场和商业》，页42

⁵¹ 同上注

⁵² 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页63

⁵³ 宿白：《隋唐长安城及洛阳城》，页418

⁵⁴ 同上注

⁵⁵ 泛指唐代的彩陶，主要以黄、绿、褐（或绿、赭、蓝）三色为主，所以称之为「唐三彩」

⁵⁶ 武复兴：《唐长安的市场和商业》，页42

⁴² 李炳武：《长安学丛书·宗教卷》（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页56引《新唐书·百官志》：开元24年，道士776，女冠988

⁴³ 《唐会要》卷50



唐三彩骆驼和外域商贾
(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什么是〈苏谅妻马氏墓志〉

墓志铭是死者亲属为纪念死者而刻的碑文，一般放在坟墓上方，予人辨识身份。在众多挖掘的文物中，最能反映中外文化交融的文物要数〈苏谅妻马氏墓志〉⁵⁷。该墓志铭文的特点是双语写作，上半刻中古波斯婆罗钵文，下半为汉字铭文⁵⁸。

汉字志文：

左神策軍散兵／馬使蘇諒妻馬／氏己巳生年廿六／於咸通十五年甲午／午
口⁵⁹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時身／亡故記⁶⁰

⁵⁷ 作铭：〈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考古》，1964年09期，页458：「志石为白色石灰石，略呈方形，宽39.5、高35.5、厚7厘米，无盖。志面刻有两种志文，下半为汉字，7行，每行6字至9字」最后一行为3字，共41字。汉字的字划因为刻得钝而浅，有的字不甚清楚。石作也不甚精致……仅正面因刻此文」

⁵⁸ 同上注

⁵⁹ 缺一字

⁶⁰ 作铭：〈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页458。汉字铭文大意：第一及第二行交代了立志人名叫苏谅，在唐担任左神策军的职位。死者是他的妻子，曰马氏。马氏死亡时只有26岁，丈夫便为她立碑纪念

中古婆罗钵文：

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于已故伊嗣俟240年，及唐朝之260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死去愿其住地与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极美好的天堂里，祝福。⁶¹

墓志铭的内容：

汉字铭文写苏谅的职位左神策军散兵马使，学者考察是787年时唐室授与留居长安的西域各国王子、使者的武职⁶²，故苏谅应为胡人。死者马氏在849年生⁶³，卒于874年⁶⁴，虚岁26⁶⁵。汉字铭文只为我们提供苏谅在唐任职、死者名曰马氏、马氏生卒时间这三个有限信息。

由于两者是外国人，我们不能单靠汉字铭文理解当中的文化，故此需要阅读更详细的原文墓志铭。以中国传统来看，苏是姓，谅为名；马氏，意为马家的女儿，马是父亲家族的姓氏；婆罗钵文墓志显示苏谅乃是家族名，而不是本名，更要补充的是他是波斯王族之后。有关马氏的身份，外文译文与汉字铭文内容有差异，死者马氏与苏谅的关系是父女而非夫妇。外文的墓志在收结时也增加了宗教色彩，为死者祈求袄（音：牵）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和天使的庇佑，这说明苏谅及马氏都是祆教信徒⁶⁶，这是汉字铭文所没有提到的。

〈苏谅妻马氏墓志〉如何反映长安文化的多元？

1. 立志人苏谅和妻子都是波斯人，但他们有汉字姓名。苏谅甚至在唐政府担任官职，可见唐室对外国人的重视。
2. 苏谅在长安任职，所以他和亡者生前应该常居于此，而亡者死后又埋葬在长安，显示有外国人在长安定居，并以此为家。
3. 刻写墓志是中国传统，而且该志也是以典型的中国风格写成：先交代死者与立志者的关系，然后简单交代其生卒，最后以立志怀念短句作结。

⁶¹ 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页69-70

⁶² 作铭：〈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页460，指出787年为唐德宗贞元三年，留居长安的西域各国王子及使者授予武职的官衔为左右神策军散兵马使

⁶³ 唐宣宗大中三年

⁶⁴ 唐懿宗咸通十五年

⁶⁵ 作铭：〈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页461

⁶⁶ 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页70

4. 墓志为双语写作，包括汉字与中古波斯的婆罗钵文，反映中西文化的融合。除了马氏墓志外，还有不少胡人选择在长安设墓⁶⁷，可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汉化，且推崇唐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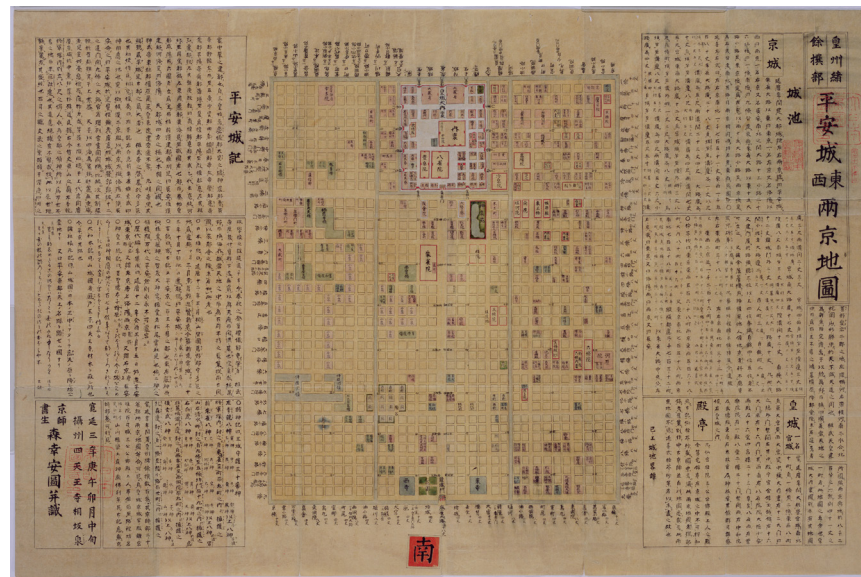
长安布局模式的影响

长安城的建筑风格对不同地区的城市建设影响深远，唐代东北的渤海国及日本京城的设计大体参考长安模式。「上京残砖」出土于渤海国五京之一的上京，即今黑龙江宁安县的东京城龙泉府城遗址。学者考究上京的整体构造仿如长安，有外廓、皇城和宫城三层，其宫城亦居于北部正中⁶⁸。



上京残砖
(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此外，日本也极力吸收隋唐文化，打造出仿长安或洛阳的都城⁶⁹。藤原京、难波京、平成京、长岗京及平安京，均采宫城居于北部正中的布局，设朱雀大街于都城正中⁷⁰。可见长安布局模式的影响之广。



平安京复原图
(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总结

综合以上所举在宗教、商业、文化层面上的胡汉交流，均建基于唐皇室对外的开放态度。唐室主动招揽外来人口入唐，唐太宗在贞观三年开始吸引塞外平民，归附者达120万⁷¹。不同种族人士来到长安，有期间性的商业活动，更有长久的文化融合，胡化、汉化同时进行。这一方面流露出唐室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另一方面，唐文化的高度亦为外国人所仰视。彼此来往，达致文化互相影响融合，产生新的结晶物，拼凑出多彩缤纷的大唐盛世。

⁶⁷ 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页64-65列举胡人在长安设墓志的文献记录，下举几例：康志达：终于长安长乐里官舍；安禄山：先居道政坊，玄宗后赐第亲仁坊；康阿义屈达干：卒于上都胜业坊之私第

⁶⁸ 宿白：《隋唐长安城及洛阳城》，页423

⁶⁹ 宿白：《隋唐长安城及洛阳城》，页423

⁷⁰ 同上注，及上文「长安城宗教列表」（页93）

⁷¹ 刘章璋：《唐代长安的居民生计与城市政策》，页34